

社会转型 与制度变迁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

李昌庚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社会转型 与制度变迁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思维

李昌庚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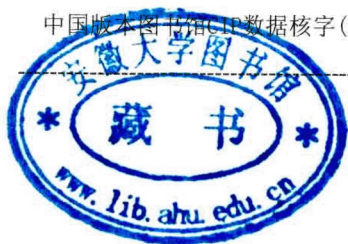
-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李昌庚著.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620-5497-9

I. ①社… II. ①李… III. ①社会转型—研究—中国②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IV. ①D616②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9342号



- 出 版 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010-58908586 (编辑部) 58908334 (邮购部)
- 编辑邮箱 zhengfadch@126.com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 印 张 10
- 字 数 230 千字
-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36.00 元

前言
Preface

经友人提醒，有了系统梳理相关论文的想法。之所以如此，主要考虑如下几点：一是笔者在国外访学期间于闲暇时间梳理相关论文时，时过境迁，发现其中有些论文存在诸多不足，有待于修改和补充。二是笔者在梳理相关论文时，虽然有些论文发表在极其普通的刊物，虽然发现其中存在诸多不足而需要修改和补充，但笔者始终自感也能坚守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并有系统表达诸多观点的想法和愿望。三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要求，从而使我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关键时期。此次新一轮改革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抓住社会平稳转型及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契机，笔者的一些论文主题正好与此相关，从而凸显了整理出版相关论述的必要性。

在整理和撰写相关论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自己主要经历了两个学术思想轨迹：一是笔者在从事专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诸多问题的症结绕不开制度变迁，因而有了最初的“提出问题”，即回答了“是不是”或“应当”的问题。在此过程中，由于笔者知识浅薄和社会历练不足，其中难免有不足之处。二



是笔者除了继续从事专业研究外，开始考虑基于中国国情如何解决制度变迁的问题，即回答“如何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停留于“提出问题”。虽然任何社会转型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与代价，但基于中国国情，如何寻求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及其国家治理现代化，乃是我国当务之急！虽然这个话题已经超出了个人能力范围，但笔者仍力图形成社会共识。这不仅有助于笔者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实现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及其国家治理现代化。

在这种科学学术生涯中，笔者至少有三点感悟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具体包括如下：

一是理性看待普通百姓，尤其农民。文化素质高低只是专业知识及其职业分工的差异而已。不同的职业及其生活圈体现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及其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靠文化吃饭”的人就比普通百姓和古人聪明。诸如乡村邻里关系、街坊市民关系、单位同事关系与古代的帝王将相关系又有何本质区别呢？同样体现了“人精”。农民首创的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即是例证。这并非是由政治家、经济学家或法学家等所创造，而恰是那帮源于生活实践的“大字不识”农民的本能追求，农民们不会被“公有制”、“私有制”等诸如此类的无谓争论和伪命题干扰，想到的往往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正是许多普通百姓嘲笑某些文人“迂腐”的原因所在。

因此，每一个人都应当怀揣一颗谦卑之心、敬畏之情去平等地尊重周围的每一个人，去遵守不同职业及其生活圈最大公约数下的共同游戏规则，并以此心态学习、工作和生活。同样，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府对于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民也不例外。如果能始终清醒地把握这一点，或许诸如农村土地改革、国企改革



革、教育改革等就会减少许多无谓的争论和伪命题的干扰。任何政党或派系，其政治游戏规则的最终落脚点都要回到普通百姓的期盼上。这也是党和政府必须始终坚持的改革落脚点！否则可能重蹈过去所谓渐进式改革陷阱。

二是理性看待少数民族及其民族问题。“理性看待普通百姓尤其农民”也同样适用于少数民族。虽然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相对贫穷，发展进程还较为缓慢，这不仅是因为自然条件、国家政策、历史因素等方面的限制，还因为有些少数民族在特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相对缺乏竞争力。但这并非意味着民族间存在智慧差异；或者某些少数民族在其自身特定语言文化环境下有着更为特别的生存法则，非其他民族以其自身逻辑思维所能充分理解。

因此，如果说人与人之间要怀揣一颗谦卑之心、敬畏之情相处，并遵守最大公约数下的共同游戏规则，那么民族间也应是如此。这应当成为塑造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理念！如果能始终清醒地把握这一点，则有助于反思“援疆”、“援藏”等民族政策及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在确保国家统一以及尊重民族自治的基础上通过平等“交流”与“合作”往往更能获得相互理解、支持、包容和自然融合。我国应当以此理念更多地让维、藏、蒙等少数民族主动融入社会转型改革主流中。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有利于凝聚更多的改革正能量，进而有利于在国家统一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平稳转型。

三是理性看待政府官员。毋庸置疑，古今中外历代政权都有昏官和庸官，但也不乏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的智官，更不能否定特定语境下某些昏官和庸官背后的智慧。然而，自古以来，在缺乏民主程序政权更替的环境下，都存在过因来自民间及其知识分子过分低估政府官员智慧的不满偏激情绪，加以不确定



的内因和外因而致使改革或革新失败，从而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历史轮回先例。

现实社会尤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社会，往往存在“假大空话”或一味地“抱怨问题”等现象。这些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一味地“粉饰太平”或“牢骚满腹”都有可能给改革添乱。其实，党和政府中许多有识之士源于社会实践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甚至比知识分子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也正是许多政府官员私下说道“官方对许多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看都不看”的原因所在。

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主动改革的前提下，基于中国国情，立足于而非跳出历史惯性下的当今中国现状，以史为鉴，如何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及其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避免出现社会动荡及人权灾难等“颠覆性错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国主动改革路线图的制定和实施。如果始终清醒地把握这一点，就能避免许多资源浪费和时间消耗，进而凝聚更多的改革正能量，形成改革共识。

最后，笔者特别要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以及该出版社的丁春晖先生！因为直至本书出版合同签订之际，笔者一直尚未谋面认识春晖兄弟，但他却经常主动来信向来自普通学校的普通老师的我约稿！笔者还要对本书中笔者相关论文发表或出版，甚至给予笔者优厚稿费的那些素不相识的杂志或出版社及其编辑、读者表达诚挚的谢意！尤其那些行政主导下所谓非核心或非权威的杂志、出版社及其编辑！正是他们没有功利色彩的朴素的平等和民主情怀给予笔者更多的鼓励、支持以及前进动力！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	---

第一篇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含义解读	3
第二章 社会转型期政治现代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和平衡	20
第三章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宽容与法理 ——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	47
第四章 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	75

第二篇

第五章 论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	95
第六章 环境保护的宪政思考	110
第七章 人大监督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123



第三篇

第八章 公司：社会化企业命题	
——兼论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的反思与重构	161
第九章 公司：经济民主与民主政治的互动	175
第十章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194

第四篇

第十一章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反思与重构	213
第十二章 中国征收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229

第五篇

第十三章 诚信源于“良治”	259
第十四章 法律人的闲言碎语	273
第一节 评“勿做‘激进批判的现实主义者’”	273
第二节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否可以起航？	276
第三节 不宜过分拔高抗震救灾英雄少年	281
第四节 不应忽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283
第五节 论学术腐败	
——兼自我反省	285
附录一 访学随笔	297
附录二 谦卑与自信	
——“国旗下讲话”	310

第一篇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含义解读

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特点以及中国特殊国情等若干因素，制度变迁过程往往充满诸多不确定风险系数，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问题。该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平稳转型及其现代化进程。故本书首先对社会转型和社会稳定含义做一简析。

一、社会转型含义解读

社会转型在其早期阶段主要指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体制变迁而带来的社会变化。因而，有学者认为用“社会转型”衡量当代中国变革未免过分狭窄，比如张恒山教授认为，用“文明转型”指代当今社会变革更为准确，并提出了从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的观点。笔者以为，如果对社会转型作广义理解，社会转型既有不同体制之间的转型，也有同一体制内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型。一般而言，所讨论的社会转型更多地是指前者。无论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还是卡尔·



波兰尼 (Karl Polanyi)、泽林尼 (Ivan Szelenyi)、倪志伟 (Victor Nee) 等,一般都是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转型等方面考量社会转型问题,比如市场转型理论等。从我国来看,中国自近现代以来主要是体制转型的问题,这也是问题关键所在。

因此,所谓社会转型,简言之,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社会转型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而向信息社会转变,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从以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及专制政治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为主导的现代社会转变。

虽然专制与民主在某些国家、某些人中仍存有争议,民主在有些国家未必是有效管理制度,但是专制政体决策失误及腐败的概率更高,即便拥有效率与有效决断的可能性,也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1]且往往孕育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民主更多地体现决策科学以及低概率的腐败,即便存有效率问题,也非简单以效率衡量,而是决策科学、低概率腐败以及公民权利彰显的应有代价,更是基于人性的权利诉求考量。^[2]因此,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乃是人类社会的应然与实然状态。这已成为社会共识。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转型要考虑三大因素,即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其中政治因素是核心。”笔者以为,除了上述因素以外,还包括外力因素作用的可能性,尤其对于后发型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在多数情况下是遵循社会

[1] 参见[美]卡尔·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5页。

[2] 参见李昌庚:“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载《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9年第7期)。



发展规律的自然转型过程，但也存在过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为作用的转型过程。倘若后者，则又必然面临着将来再次转型的问题。至于有学者提及的人均 GDP 进入 1000 美元 ~ 3000 美元时期属于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对国际上一些社会转型国家经济指标考察的一种总结。但这种经济发展指标并非是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共性，更非意味着经济因素是促成社会转型的唯一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印度早期的民主转型，也无法解释中国清末民国时期社会转型等近现代史以及原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当前的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社会转型问题。

如果从体制变迁来看，由于市场经济的较早发展等因素，国外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至少已经初步完成了现阶段的社会转型。但从我国来看，社会转型却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程。笔者以为，我国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社会转型是清朝末年、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帝制被推翻，社会开始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型，但由于日本侵略等原因而中断；第二次社会转型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期望建立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教条主义等因素而发生严重畸形；第三次社会转型是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前两次社会转型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即从计划经济及集权政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转型。某种意义上说，第三次社会转型仍然是第一次社会转型的延续。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解与运用暨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惯性助长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缓慢，这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见的。中国社会转型当前依然是一种体制转型过程，这也是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的社会转型不仅面临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暨信息社会的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问题。在儒家等传统文化、民族问题、台湾问题、区域发展



不均衡、城乡二元格局特殊国情背景下，而对“马克思主义暨社会主义”的不同解读与民主政治转型的交集又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中国特色”，进而使问题趋于复杂化。这种同步推进的“多重”转型恰是国外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较少经历的。

二、社会稳定含义解读

（一）社会稳定概念解析^{〔1〕}

稳定有绝对稳定和相对稳定之说。但绝对稳定是公民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应享有的权利被剥夺或限制的结果。因此，绝对稳定看似稳定，实际上却是“死水一潭”，潜伏着巨大的不稳定。进而言之，绝对稳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它常发生于专制社会或是较为薄弱的民主宪政社会初期。^{〔2〕}这在世界各国历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表现得最为典型。

关于社会稳定的内涵，学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社会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的稳定。比如邓伟志、沈跃萍等人提出：“任何国家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政治要民主，就必然要从静态有序的政治稳定走向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3〕}陶德麟、汪信砚等人认为：“社会稳定不是指社会生活的稳而不动、静止不变，而是指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调节而达到的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4〕}丁

〔1〕 本部分内容以“人口流动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宪政思考”为题发表于《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加入本书时，对此作了修改和补充。

〔2〕 笔者在1995年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中提出该观点。后到高校工作，才考虑发表此文。参见李昌庚、万腊庚：“公民权利与社会稳定关系初探”，载《行政与法》2004年第7期。

〔3〕 邓伟志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4〕 陶德麟主编：《社会稳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水木、陆晓文等人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稳定是指一种全面有效的社会管理条件下的社会相对有序状态。”〔1〕黄建钢等人认为：“社会稳定是从社会不稳定发展而来的，而社会不稳定又是从社会稳定变化而来的。”〔2〕李笃武认为：“社会稳定要由静态有序的稳定转向动态有序的稳定。”〔3〕曹德本也认为：“社会稳定作为一种动态的存在形式，本身就是发展，而且是发展的理想状态。”〔4〕邓小平早就说过：“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5〕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专制主义“大一统”的僵化的社会“稳定”大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延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对此，西方学者休谟、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以及中国有些学者均有论述。当帝国列强打开清帝国门户时，马克思曾经将其形容为“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到新鲜空气”，等等。〔6〕

因此，所谓社会稳定是指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公民权利享有基础上，社会规范有序和合理渐进的发展。这种稳定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享有和释放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容纳了社会上所有富有理性的、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切活动。这种社会稳定随着时间推移，稳定的“动态”幅度将愈趋平衡，

〔1〕 丁水木等：《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社会稳定机制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2〕 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 李笃武：《政治发展与社会稳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4〕 曹德本、宋少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以下。

从而使社会愈趋民主法治与理性。^{〔1〕}

唯有正确理解社会稳定含义，才能准确把握公民权利与社会稳定关系，从而做出有利于公民权利享有与社会稳定这两方面的合理评价。这对于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公民权利与社会稳定关系^{〔2〕}

1. 保障公民权利享有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在近代社会以前，公民权利享有通过开明政治得以实现。在自然经济或小商品经济的开明政治社会，适应当时经济需求的公民权利享有一定程度地促进了当时经济发展。同时，一定程度的公民权利诉求有助于提高政治透明度和政府的相对廉洁性。这些都有利于形成特定时期的短暂社会稳定。这也是衡量人类近代社会以前政治是否相对开明的重要因素。

但“公民权利”概念所具有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近代社会，是随着民主立宪活动产生的。因此，讨论公民权利享有，其涵义及其意义也主要体现在近代社会。在近代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享有，是通过民主法治实现的。

在专制社会或民主法治较为薄弱的社会，看似稳定性可能更高，但这是一种绝对稳定，是以限制或剥夺公民权利享有作为代价。实际上，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二者之间保持低度平衡的那些政体，面临着日后不稳定的前景。^{〔3〕}在这种社会，公民权利享有的扩大，必将带来社会不稳定；而且公民权利的享有程度越大，社会的不稳定性越大。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参

〔1〕 参见李昌庚、万腊庚：“公民权利与社会稳定关系初探”，载《行政与法》2004年第7期。

〔2〕 本部分内容以“公民权利与社会稳定关系初探”为题发表于《行政与法》2004年第7期。加入本书时，对此作了修改和补充。

〔3〕 [美] 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7页。